

# 天主教傳教士雷鳴遠對民國政治的觀察與醫療福傳行動（1927-1940 年）<sup>1</sup>

陳聰銘

比利時魯汶南懷仁研究中心研究員

## 提要

雷鳴遠 (Vincent Lebbe, 1877-1940) 本為比利時籍，入法國遣使會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Lazarist) 有志於海外傳教活動，1901 年被派遣到北京。在華傳教士因法國天主教保教權 (Catholic Protectorate) 而享有特權，在中國人眼中，天主教自此背負著列強帝國主義之工具的負面形象，雷鳴遠認為這就是天主教無法在中國傳開之主要原因，因此他主張要將中國教會交由國籍教士主導，以愛國行動證明愛國與愛教不相違背。

他的主張並不獲大多數傳教士的支持，而遭其修會召回法國。在 1920 至 27 年留歐期間，除了幫助中國留學生和創辦宿舍與報刊進行智識傳教之外，他還心繫中國局勢發展。雷鳴遠自 1927 年 3 月從歐洲回到中國後，所面對的是中國國內政治紛亂：軍閥互相爭戰、政權分裂、國共內戰和中日戰爭。本研究以雷鳴遠對當時主要政治人物，如蔣中正、馮玉祥、汪精衛等人，和黨派（國民黨左右兩派和共產黨）的觀察與批判做為出發點，再分析他支持特定政黨－國民黨右派陣營－的原因。此原因的探究使吾人了解為何他積極組織前線醫療服務團，加入協助以蔣為首的國民黨軍隊之原因。

本研究的目的有二，一是解析雷鳴遠對民國政治之看法了解他對民國政治的願景。二是他將愛國的主張付諸行動，言行如一，他的行動對民國政治發展、重要政治軍事人物的影響；同時，也探討對中國天主教會之影響。

**關鍵詞：**雷鳴遠、中國政教關係、戰時天主教志願醫療服務團、在華法國保教權、《中國天主教青年學報》

**投稿時間：2020.12.08；接受刊登：2021.08.15；責任編輯：楊子春**

---

<sup>1</sup> 筆者參與 2020 年 11 月 20-21 日輔仁大學宗教系所舉辦之「角力、並存還是共生：宗教與政治的今昔」研討會做本論文之口頭報告，題目為〈1927-1940 年間雷鳴遠對民國政治的觀察與福傳行動〉，筆者除了增修本研究之外，並向兩位匿名審查人所做之批評建議致謝。

## 前言

雷鳴遠（Vincent Lebbe, 1877-1940）（圖 1）可謂中國天主教近現代史上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也是教會人士津津樂道的人物，他的言行對日後中國教會的發展影響深遠。1901 年 3 月 16 日他初抵中國，所處的時代背景是自清末進入民國後內憂外患之時期，目睹他熱愛的國家和人民如何在此困難的環境下奮鬥求生存。雷鳴遠置身的時代脈絡與當時中國國內外政治局勢環環相扣，他對政治之看法對日後進行福傳活動的抉擇和方式有決定性影響。

雷鳴遠自 1927 年 3 月從歐洲回到中國後，所面對的是國內政治紛亂：軍閥互相爭戰、政權分裂、國共內戰和中日戰爭。本研究擬以雷鳴遠對當時主要政治人物，如蔣中正、馮玉祥、汪精衛等人，以及對黨派（國民黨左右兩派和共產黨）的觀察與批判做為出發點，再分析他支持特定政黨 – 國民黨右派陣營 – 的原因。此原因的探究使吾人了解為何他積極組織戰前醫療服務團，協助以蔣為首的國民黨軍隊之原因。

本研究的目的是有二，一是解析雷鳴遠對民國政治之看法是否可投射出他對民國政治的願景，願景為何。二是他將愛國的主張付諸行動，言行如一，對民國政治發展、政治人物是否產生影響；同時，也探討對中國天主教會之影響。

研究架構之安排大致上以時代先後為序，首先，筆者闡述雷鳴遠初期（1901-20）以「愛國心」和培育國籍教士成為中國天主教會棟樑為主軸的傳教法，再描述他在歐洲（1920-27）進行「學生福傳」活動之方式和成效，此階段對雷氏日後人際關係之建立具有關鍵性影響。第三部份則分析他 1927 年回到中國後，結合對政治局勢和人物所做之觀察與判斷，以及北伐統一後他對中國未來願景之因素所形成的政教觀，並據此成立醫療服務隊投入以蔣氏為首之國府軍隊的抗日行動，直至 1940 年逝世。第四部份歸納出雷鐸四十年的傳教生涯對中國天主教會的貢獻，評析當代人物對他的政教觀和抗戰醫療行動之論斷，並探討雷氏之行動是否引發負面影響。

華人學界的相關研究可謂不少，大多以中文參考資料為主，但是都存在同一問題，那就是幾乎無學術研究成果探討雷鳴遠對軍閥的看法與雙方關係，以及他對民初政治的觀察；就算是提到雷與蔣的關係，也無深入探討雷氏個人對蔣氏的看法。筆者至今只找到雷鳴遠在他所創辦的法文《中國天主教青年學報》（*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和雷鐸在比利時創辦

的修會「輔助傳教會」（*Société des Auxiliaires des Missions, S.A.M.*）成員 Paul Goffart 和 Albert Sohier 收編的 *Lettres du Père Lebbe*（雷鳴遠神父書信），其中所收錄的數封書信對此議題多所闡述，是第一手資料文獻。另一個著作是趙雅博（1917-2015）的《烽火中的雷鳴遠》，但該書體裁屬敘事，主要以作者掌握之書面資料和記錄跟隨雷鐸者所述為本，卻無標示資料文獻來源，是以，這筆資料較為次要，也只能供筆者對照參考，少量引用，筆者仍主要以雷鳴遠書信為主體。

雷鳴遠自 1933 年積極從事醫療行動後日夜忙碌，書信愈見稀少，完成一封信的期間愈加拉長，甚至長達 3 或 4 個月以上！他描述醫療隊行動的資料相當有限，是以，筆者援用曾親身參與醫療隊的成員之憶述加以補充，這時雷氏手創的耀漢、德來兩修會出版的《雷鳴遠，1877-1940》提供些許珍貴資料。

## 壹、雷鳴遠所見的清末民初中國天主教發展情況

雷鳴遠出生於比利時根特（Gent），父母親各有一半法國血統，他從小在比、法邊境土爾奈（Tournai）就學，受法國文化影響很深，也立志要進入聖文生（St. Vincent de Paul, 1581-1660）所創辦的遣使會（*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CM, les Lazaristes*）從事修道生涯。他聽了北京代牧樊國樑（Alphonse Favier, 1837-1905）講述義和團運動中許多傳教士和信徒勇敢殉教事蹟而大受感動，決定隨樊乘船至中國傳教。

廿世紀初的中國有如風中殘燭，列強弱肉強食之下，帝國雖然尚未分崩離析，卻也淪落於半殖民狀態，列強奪取租界與切分勢力範圍，中國天主教的發展情況也反應了列強帝國主義下拓展其文化思想的野心。1844 年法國以黃埔條約保護天主教為媒介干涉中國內政事務，而後歷經其他條約法令鞏固與發展，直到世紀末的成熟期，法使節以外交和武力對所有傳教士和一般教徒的人身安全與財產加以保護，傳教士也因條約獲得特權，深深影響到中國傳教區內國籍教士地位、神職培育和教務處理。（Alexandre Tsung-ming Chen, 2013: 125-171 and 285-297 [appendices]）；Alexandre Tsung-ming Chen, 2015: 283-297）各地傳教士則仗恃法律地位優勢，介入信徒的司法案件中，使官民對天主教的整體印象大為反感，不時有官員抱怨傳教士干預司法，應立法禁止。（呂實強主編，1974：2）因清廷與列強處理教案常以賠款結案，

被迫劃撥租界給列強而引發衝突。這一切有如惡性循環，所以對中國官民文人而言，基督宗教被視為西方帝國主義之標記，列強的工具。（André Chih, 1962: 149）1891 年湖南長沙印製一批反教漫畫，內容將耶穌、傳教士和教民等醜化貶低為牛羊豬等牲畜，待中國正義之師殲滅（圖 2），這反應了拳亂之前中國社會對傳教士和基督宗教的形象帶有負面情緒。1901 年雷鳴遠被法國遣使會派遣到北京時所看到的中國社會，正是清廷尚與列強就拳亂問題協商善後之期間，一般教外人士仍舊對基督宗教懷有歧見。但是，這種歧見也有部分因素是傳教士所造成的。

## 貳、雷鳴遠以提升國籍教士地位和「愛國心」為主體的政教觀

雷鳴遠的政治觀以「愛國情操」為核心，他的詮釋方式對當代的中國天主教徒有極大的影響，為了解他主張的內容和實踐，吾人需觀察民國初年時代背景中的天主教團體發展情況。

雷鳴遠一開始在北京近郊傳教，於 1912-1917 年間被調到天津，因傳教方式親切活潑、中文流利，不少人皈依天主教，使他在當地聲名大噪（圖 3）。1916 年底天津的「老西開」事件是中國天主教會的轉捩點，該事件因主教座堂建築用地位於臨近法租界的中國領土上，法領事極力將法租界擴張至主教座堂，此事引發了天津天主教民和國籍教士對法國帝國主義和其保教權的不滿，也反對傳教士與國籍教士地位不平等的現象，激勵了一股中國人愛國情操，這風潮造成中國北部傳教士和國籍教士與教徒之間的衝突。（Léopold Levaux, 1948: 169-190）雷鳴遠和他參與創辦的《益世報》積極報導事件原由與經過，雷本人也站在護衛中國的立場，不僅使他和《益世報》之名廣揚，也成為許多傳教士批評對象。

雷鳴遠和同會夥伴湯作霖（Antoine Cotta, 1872-1957）從這事件中獲得啟發，他們發展出一套所謂「天津的方法」（Méthode de Tientsin）傳教心得。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天主教之所以不吸引中國人，主要的原因在於這個信仰表面不僅洋化，連主導教務者都是外國傳教士，這對中國教會發展有不利影響。他假設一旦傳教士的母國成為中國的敵國，中國人如何再信任該國籍的傳教士？這將會是傳教的障礙。是以，為了克服這先天上的缺點，傳教士應該盡力與中國人相處，使自己成為中國人，研究傳統習俗、語文、文學、思想，

只要不違反天主教義，盡量接收中國所有的事物，直到忘了自己是外國人之事實。（Claude Soetens, 1982: 125-126）

1917年3月雷鳴遠因這事件被遣使會長上遠調至浙江紹興當本堂神父。為避免混亂擴大，9月寧波代牧趙保祿（Paul-Marie Reynaud, 1854-1926）向代牧區所有神職和教友發布一指令，針對幾項當時引發國籍教士與教徒議論的問題，包括任命國籍主教和法國保教權等，表達代牧不改變現狀的保守立場，並指示所有屬下神職應配合長上指示的方向行事。雷鳴遠向主教表達不同意見，他這長篇幅陳情文是他16年來對中國天主教發展的觀察心得，並提出針砭時弊之見。

在這篇文章中，有三點與本研究相關：愛國情操、國籍教士和保教權，這三個議題可說是當時中國天主教最重要的問題。文中他紓發對「愛國情操」的看法：

中國基督徒有權利愛國，且應更勝於歐美國家基督徒自認為負有愛國義務的心態般，這種力量是崇高的。在歐洲我們說這愛國心有如花朵從基督宗教中綻放。這種崇高性特別是一種力量，或許是一個國家最安全的外圍城牆。因為愛國心對一個國家而言是一股力量，對教會也是。<sup>2</sup>

他認為教會中應該要將愛國心加入教育項目中，使之成為天主教徒的義務，它不會因我們遺忘而消除，也不會因我們將它壓縮就可以限制它的發展；相反地，它可自行成長。然而，如果這種愛國心是在教會外發展，教會就愈需擔心，因為教會與教徒之心差距愈形擴大。（Paul Goffart et Albert Sohier, 1960 : 140）然而問題是在華傳教士無法教導教徒如何以天主教方式愛國，這責任應該歸於國籍教士，但是國籍教士卻遭歧視。雷鳴遠也指出教廷以往多次強調培養本地聖召之重要性，他也說教會史中從未見一個國家民族可由一批外國傳教士努力下皈依基督宗教。所以傳教士應該努力培植本地教士來取代傳教士，但這並非意謂傳教士馬上交出教務，而應是以此為目標盡快達成。培養本地教士的目的是要產生本地主教，再以國籍主教為中心發展本地教會（P. Goffart et A. Sohier, 1960 : 140-149），如此天主教會才可真正地

---

<sup>2</sup> Lettre à Mgr Reynaud, Ninpo, 18 septembre 1917. Archives Archiépiscolales à Maline, Fonds Mercier (AAM), vol. 22, 200, China zaak Lebbe 1917-1925.

達到「中國化」程度。吾人可由雷鐸喊的口號：「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領悟他心中的傳教宗旨。（André Boland, 1927.3: 2）

雷鳴遠對於法國保教權大加鞭撻，稱是天主教傳播史中最大的人為障礙，是教會吸收本地知識份子一個絆腳石。他舉一個例子是 1903 或 04 年美國多位基督教牧師發動一場活動抗議美國對中國政策，與中國教徒站在一起杯葛美國商品，但是美國大使與領事卻不引以為忤，也不怪罪牧師站在中國的一方，但是牧師卻深得中國教民的完全信任。（P. Goffart et A. Sohier, 1960 : 151-153）

1917 年北京段祺瑞政府主張應參加歐戰，廣州軍政府的孫中山不支持，當時輿論分歧，雷鳴遠則主張中國應加入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對抗以德國為主的同盟國，他認為參加協約國有助於提振中國國際地位。（〈近事：本國之部〉，1917.10：300-301）在趙保祿代牧同意下雷鐸舉辦一場為中國祈禱會，但他卻在會中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激發聽眾愛國情緒，他的講詞也由《益世報》刊登，一時聲望名氣遠播，但是雷鐸遭到遣使會巡視員的警告，稱雷違反教會不可涉入政治活動之規定，不服從長上命令；而且，之前雷既然遭處罰由天津調至南方，如今他所屬的傳教區可能也無法再留他等等威脅語氣。（P. Goffart et A. Sohier, 1960 : 159-160）

1919 年教廷任命廣州代牧光若翰（Jean-Baptiste Budes de Guébriant, M.E.P., 1860-1935）為中國教務巡閱使（apostolic visitor），光若翰 10 月到上海後向中國所有傳教區的教士發出一問卷，雷鳴遠在問卷中除了重複上述他給趙保祿的看法之外，他強調中國天主教洋教色彩太重，應該廢除法國保教權，並加強培育國籍教士，這也無怪乎在中國國難當頭關鍵時刻，教外人士都以懷疑的眼光看待教徒的愛國情操，是以，他主張中國教會應該交由國籍教士主持。（Claude Soetens, 1882: 256-258, 264, 281）雷鳴遠這個主張始終如一，直到生命最後一刻方休。

雷鳴遠和同儕湯作霖與遣使會長上漸行漸遠，光氏建議雷鐸可在歐洲向中國留學生福傳（Ernest P. Young, 2013 : 203），於是在光若翰的安排下，兩人先後被送回遣使會總會。雷鳴遠於 1920 年 4 月與三位中國留學生抵達巴黎，開始另一段傳教生涯階段。

## 參、旅歐時期與中國留學生的相處（1920-1927）

民國初年一些留歐學人回華後，提倡「勤工儉學」運動，鼓勵年青學人到西方國家求學，學成歸國後以新知救中國，響應的學生大多前往美國和西歐各國，歐洲國家中以法國為最。一開始中國方面運動召集人尚提供獎學金，但是不久財源斷絕，許多學生手頭拮据，打工收入微薄，課業又繁重。當時歐戰方結束，西歐經濟蕭條，通貨膨脹問題嚴重，許多企業也紛紛倒閉，影響所及，不少學生工作無著，生活出現困難，語言水準又不足。（陳三井，2013：146-149）當時自由派思想在歐洲知識份子中頗為流行，歐洲社會又陷入危機中，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左派思想快速發展，在留歐的中國學生中有不少人宣揚共產主義，並於1922年在巴黎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並在比利時和其他歐洲國家大學中設立分部。（陳三井，2013：178-184）

雷鳴遠一到達法國馬不停蹄，前往梵蒂岡謁見教宗，也會見多位教廷高層，除了表達他對共產主義在中國快速發展感到憂心之外，也與他們分享他如何對留歐中國學生進行福音傳播的方法，並計畫成立一個天主教傳媒和針對中國留法學生傳播天主教社會訓導理念的機構，<sup>3</sup>而這正是往後他在比利時和法國推動的事業之方向。

當時在法、比國的中國留學生因「勤工儉學」運動的失敗而生活窮困，雷鳴遠不分教友與否，只要對方求助，都盡力幫助他們。1920到1927年間他在西歐各國多次舉辦座談會，講述他廿年在中國的寶貴傳教經驗與見聞，也藉此結識許多當地信仰堅定的教友，他席間都會問信友聽眾是否願意成為中國留學生的接待家庭，為此解決多位學生居所問題，他自己父母親家也收留了一位。（J. M. Tan, 1927.3: 10）此外，他一開始辦夏令營講授天主教要理，以要理講授內容教授法文，課餘也教學生法文。1921年在光若翰的協助下，由巴黎外方傳教會提供在巴黎近郊一棟房子成立了天主教學生宿舍，除了供學生食宿外，雷鳴遠還成立「中國天主教青年會」（Associatio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也幫學生找尋打工機會、就讀學校和籌募獎學金

---

<sup>3</sup> Lettre à un destinataire inconnu, Rome, janvier 1921. AAM, vol. 22, 200, China zaak Lebbe 1917-1925.

（Vincent Lebbe, 1925.7-8: 315-316）。<sup>4</sup>他的「學生宿舍傳教法」頗收成效，感動了一些原本是反基督宗教的學生改而信仰天主教。（Alexandre Tsung-ming Chen, 2020: 239-240）<sup>5</sup>於是，在幾位比利時神職朋友，特別是包朗（André Boland, 1891-1955）的協助下，1926 年在魯汶（Leuven/Louvain）成立「魯汶中國天主教[學生]之家」（Foyer “Home” Catholique Chinois de Louvain），這是雷鐸和朋友在比、法、瑞、德等國成立的學生宿舍中最成功，也最負盛名的一個。

1925 年雷鳴遠和包朗共同創辦了《中國天主教青年學報》（後簡稱：《中天青報》）（*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sup>6</sup>刊物主旨是向留歐學生推廣天主教，文章主題多是推動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在歐洲天主教徒留學生情況、在華天主教之發展與中國最新發展局勢。1927 年雷鳴遠回中國後，不定期地寫文稿告知讀者他的動向和中國政治與戰爭情勢發展的相關訊息。該刊物成為聚集所有關心中國天主教發展和中國國運讀者之注意，雷鳴遠也得以透過文字力量維繫與歐華讀者之關係，並發揮他的影響力。

## 肆、回到戰火連天的中國

1926 年 10 月 26 日教宗庇護十一世（Pius XI, 1922-39）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的主持下，進行第一批六位中國籍主教祝聖的大典。之後，六位主教在雷鳴遠陪伴下先到法國和比利時等國參訪，再回中國。（圖 4）在孫德禎主教的邀請下，雷鳴遠決定於翌年回中國在孫主教權下的河北蠡縣（後改為安國）代牧區工作，如此也解決了在中國的遣使會長上不願再接納雷鐸之問題。

當時的中國正陷入南北政府分裂、軍閥混戰和中共竄起的年代，他開始觀察中國國內局勢演變和各黨派之特色與勢力消長。雖然國家情勢極度混

---

<sup>4</sup> 當時統計，1923 至 1927 年間，全部獎學金和宿舍相關經費的金額龐大：逾 171 萬比郎，百餘位學生受惠。Anonymat, « Comptes de notre action », *Archives de Vincent Lebbe, Archives du monde catholique*, ARCA, Louvain-La-Neuve (LLN), D45, ff. 12-19.

<sup>5</sup> 其中包括一位運動領導人。Anonymat, « Comptes de notre action », ARCA, LLN, D45, f. 58.

<sup>6</sup> 刊物主編稱以法文和中文出版，然而筆者只找到法文版，1936 年交由雷鳴遠創辦的「輔助傳教會」（*Société des Auxiliaires des Missions [SAM]*）編輯出版，改名為《輔助傳教會期刊》（*Revue SAM*）。



亂前景黯淡，但這時的他內心卻充滿喜悅和衝勁，因為他已回到他熱愛的中國。《中天青報》刊出他抵達中國所寫的第一封信，文字間掩不住他的喜悅：

（……）我親愛的學生、孩子們，我還是要再告訴你們說我並不失望，而且我內心平靜，也充滿喜悅和苦痛，還有……**我比以往更加是中國人了！**阿門。（Vincent Lebbe, 1927.7: 7. 書信日期 1927/4/6）

7

雷鳴遠提筆寫信時刻，或許已經對於申請中國國籍有所決定了。國籍只是身份證明，但是他內心已成中國人。他獲得國籍的日期是 1927 年 8 月 8 日（Léopold Levaux, 1948: 304），此後更是名副其實，可高喊熱愛中國，提倡愛國情操。

### 一、對中國局勢的觀察

睽違七年後，雷鳴遠終於回到中國，於 1927 年 3 月 21 日在上海登岸。他極度關心中國最新局勢發展，密集閱讀中外新聞報導和傾聽當地人民對政局的看法。此時的中國進入政治混亂時期，北京政府權力大多操在軍閥手上，彼此相互爭戰，總統、內閣總理與國會互鬥傾軋；孫中山於 1917 年在廣州成立軍政府後，為討伐北京政府政客破壞共和政體和臨時約法而發起「護法戰爭」。孫氏又因廣州政府軍力不足、國民黨組織紀律不佳，1922 年 8 月願意接受蘇聯代表越飛（Adolf Joffre, 1883-1927）建議國共合作。國民黨代表大會於 1924 年 1 月底同意施行「聯俄容共」策略，接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沈雲龍，1981：136-144）1925 年 3 月 12 日孫氏去世後，廣州政府於 1926 年 6 月 5 日決定出師北伐以完成中國統一，國民黨左派份子在蘇聯代表鮑羅廷（Mikhail Borodin, 1884-1951）慫恿下，1927 年 2 月 27 日在武漢成立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4 月汪精衛出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撤除蔣中正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國民黨右派在 3 月 23 日攻克南京後，4 月 18 日決定以南京為國民政府所在地。因是一黨而有兩國民政府三中央黨部（武漢、南京、上海），即世所稱「寧漢分裂」。隨後汪精衛發現蘇聯之對華野心後，於 7 月 15 日宣布「分共」，8 月 1 日中共發動「南昌暴動」以回應汪「分共」之措施，是為共黨武裝叛亂之始。（沈雲龍，1981：216-218）是以，自 1927 年 4

---

<sup>7</sup> 引言中劃線之字句在原文中是法文大寫，為雷鳴遠特地強調之語氣。

月至 8 月為止是「寧漢分裂」時期，隨後，國民黨進行「清黨」。1928 年 2 月初，黨中央決定停止「聯俄容共」之政策。雷鳴遠所看到的中國政治局勢正是民國初年內戰頻仍、共黨興起的時期，1931 年後又加上日軍侵華。

他觀察到教徒很關注政局的發展，因為他們關心未來的新政府對天主教會和宗教自由的態度。他發現「從他們的反應中，得知廣州政府較受人民歡迎，但是國民黨政府內部也分兩派系，人數較多的是右派，其中許多成員均參與反基督教組織，不少出身自黃埔軍校的軍人，這一派也為溫和嚴謹善良的族群所支持；另一為左派，共產主義色彩較濃，組織方式仿照蘇聯共黨反基督宗教、立場極端、行為較莽撞，且較受行為不佳者青睞」。（Vincent Lebbe, 1927.6: 4, 6. 書信日期 1927/3/19, 29）

雷鳴遠也觀察到共產黨快速擴張，在「聯俄容共」時期共產黨人公開活動，以工人學生為對象，趁機擴大招收成員，而且左派的武漢國民政府將武器交給已吸收的人民，使之成為民兵，這些已受共產主義影響的民兵開始在地方上擾亂治安，四處破壞劫掠教堂。這些武裝共黨民兵一旦佔據某村鎮，就開始大肆宣傳共產主義，四處成立工會舉辦集會活動，對反抗者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並整肅基督宗教教徒，已有教徒因信仰喪命。（Vincent Lebbe, 1927.6: 6-8）

1927 年 8 月底，北伐軍勢如破竹，大軍已推至山東西部，之前戰役已經大挫北方軍閥勢力，如今北伐軍距離河北保定不遠，張作霖軍隊準備做最後一搏。此時，雷鳴遠聽說蔣、閻、張等各勢力談和之傳聞，「為的是建立聯盟以對抗共產主義擴張；對蔣而言，共黨常趁北伐軍與軍閥戰鬥時偷襲，所以如與北方軍閥達成停戰後，他可集中軍力對抗湖北、湖南和江西的共軍」（Vincent Lebbe, 1927.12, 10. 書信日期 1927/8/26），但此終歸傳聞，武漢國府也隨之解散，和平尚未降臨，然而中國仍舊分裂。

## 二、對各交戰派系軍隊與幾位軍閥的看法

雷鳴遠在孫德禎代牧主持的河北安國傳教區工作，他也常到同是第一批國籍主教之一趙懷義主持的宣化（今併入張家口市）代牧區參與活動，所以他的活動範圍大致上都在河北境內和鄰近華北省份。在北伐期間，該地區因臨近北京而成為兵家必爭之地，1927 和 28 年期間也多次成為戰場，傳教區內的教堂常成為收容接待軍隊的地方，因此他有不少與幾位軍閥軍隊朝夕相

處的經驗。此外，他與其他傳教區教士互通訊息，對其他地區動態也有所知聞。

整體而言，他發現不論是國民黨左派或右派的軍隊都對基督宗教懷有敵意，這是因為當時社會風氣與思潮使然。<sup>8</sup> 但是，各派軍士對天主教會的態度仍受該軍隊統帥個人影響，當地天主教團體與各派軍隊互動情況好壞也各有不同。首先，他對南軍的第一印象是有紀律，所以評價是較為正面的。在他多封書信中曾描述一事件發生在他工作的堂區中：「當南軍抵達教堂時，是教友接待軍隊，那時許多軍士們對天主教友表示輕蔑的態度，指著他們大罵『帝國主義的走狗』，但當該教友表示他們的傳教區是中國人管理（主教是中國人孫德禎），還有一位歐洲傳教士（指雷鳴遠）在這位國籍主教權下工作（當時雷鐸不在場），這些軍士頓時態度 180 度轉變，變得非常禮貌。」（Vincent Lebbe, 1928.8-9: 6-7; Vincent Lebbe, 1928.10: 29）之後，雷鳴遠有機會向他們發表演說，除了向他們表達反對西方帝國主義，中國命運由中國人決定之外，也表示完全支持廣州政府對建設國家的計畫。雷氏也發現這些非信徒軍士無法忍受中國教徒崇敬外國聖人：「為何你們掛的不是孫中山的遺像呢？」雖經教徒解釋，也無法釋懷。但當他們發現了教堂中貼有中國式聖母像時，又豁然開朗說：「為何你們所有聖像都不是如此呢？」當時社會上反基督宗教情緒仍高漲，雷鐸就發現臨近村莊的教堂受損嚴重，因為遭破壞的都是西方人形象的聖像雕刻或圖畫。（Vincent Lebbe, 1928.8-9: 8-9）

雷鳴遠對閻錫山<sup>9</sup>的軍隊嚴守紀律表示讚賞（Vincent Lebbe, 1927.12: 14. 書信日期 1927/11/10）；但對人們所稱「基督將軍」的馮玉祥，卻有不同評價。他指出「馮氏對外表示與蘇聯基於政治因素維繫友好關係，但他不對共產主義產生興趣，他發現馮軍不僅完全信奉三民主義，軍隊操守嚴謹，馮氏本人也關心人民生活疾苦，評價極佳，但是他的軍隊對天主教表現出敵對與厭惡的態度。」（Vincent Lebbe, 1928.10:29; Vincent Lebbe, 1929.9-10: 232-233. 書信日期 1929/6/29）雷鐸則大加批評奉系張作霖部隊，他指出「張作霖佔領北京地區期間，他將市政所有公務人員改換為他的人馬，1927年10月初當奉

<sup>8</sup> 特別是 1922-27 年間的「反基督教運動」期間。

<sup>9</sup> 雷鐸之所以對閻錫山印象較佳，兩人交情匪淺，原因可能是與閻的一位侄子閻效文 (Yen Sio Wen, 1899-?) 在比國求學，受雷和博朗等人照顧而成為天主教友相關。閻效文 1924 年離比回國，擔任山西省太原工業廳工程師。《Rôle de l'Abbé Boland dans l'œuvre des Chinois》. ARCA LLN, D45, f. 58; 王慶餘, 2011 :500。

軍在宣化失利時，軍隊連同所有公務人員都退出該地區，使當地只剩一批無警長指揮的警察維持秩序，他的軍隊也隨著軍事行動到處搶劫破壞，軍紀甚差。」（Vincent Lebbe, 1927.12: 13, 18. 書信日期 1927/11/10）

### 三、對南方國府領導人蔣中正的看法

在多位政治人物中，雷鳴遠對廣州政府領導人蔣中正印象極佳：「他所表現的就是一位具備優秀才能的人，而且也公開表示與左派的共產主義思想者劃清界線。」（Vincent Lebbe, 1927.6: 5）此時，雷所觀察的是「寧漢分裂」時期的國府。眼見共產黨在湖南和其他省分影響力漸大，他說：「我相信蔣介石一旦解決北方問題，處理完這些匪黨後，將會去解救可憐的湖南人民，和其他省份中同遭可怕赤色暴政折磨的人民。（……）到時受影響省份將恢復秩序，重拾以往繁榮，新政府將排除共黨份子於外，拒絕社會主義烏托邦，屆時，教堂將再重新開放，之前被關閉的教堂將再交還教士。」（Vincent Lebbe, 1927.10-11: 8-9. 書信日期 1927/6/8）他期待中國統一在南京國民政府下和平降臨，屆時國家將享有宗教自由。（Vincent Lebbe, 1927.6: 5. 書信日期 1927/3/19）他相信在當時眾多的政治人物與派系中，唯獨蔣氏具有能力統治中國，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崇尚宗教自由的民主國家。

然而，雷鳴遠對蔣氏離婚（一妻兩妾）與再婚之舉，表達其批判的立場。1927年12月1日蔣中正與宋美齡以基督教禮儀盛大舉辦婚禮，雖然他認為這對該國民黨領導人來說應該是好事，但接下來他說：

最奇怪的是蔣介石需離婚，再辦結婚－這變樣的基督新教（以如此莊嚴的方式）再次確定了教義和實際執行方式彼此不一致的情形，甚至是對這樁最嚴肅重大的事。這場婚禮對那些誠心想知道何為耶穌基督真正教會（意指天主教會）的人是一個很好的護教（apologetic）課程。（Vincent Lebbe, 1928.3-4: 9. 書信日期 1928/1/7）

雷鳴遠是以《中天青報》讀者為訴求對象，從天主教會眼光來評斷蔣宋婚姻。天主教會向來堅持一夫一妻制、反對重婚、離婚和納妾，但不反對配偶逝世後再婚，但蔣的情況是離婚之後再婚。是以，雷趁機批評天主教會，在華最大競爭對手基督新教教會之餘，向大多為望教友和新教友的留歐中國學生趁機補充說明天主教的婚姻觀。從此一批評來看，雷並非盲目支持蔣氏，而是經過理性的觀察和思考。

## 伍、北伐統一後對中國的期待與憂慮

當 1928 年 5 月 31 日北伐軍打敗奉軍拿下河北保定時，他和當地居民都充滿喜悅，因為「南軍對教會和人民較友善」。（Vincent Lebbe, 1928.7: 14）所以，他開始對統一後的中國懷有一份憧憬。他發現北伐軍軍紀良好的原因在於：有中心思想。有一次，一支北伐軍在雷鳴遠所處的教堂借宿，晚間將領集合軍官士兵做約一小時的精神訓話。一開始，該將軍勉勵所有人成為最盡責的革命軍人，打倒帝國主義者、欺壓百姓的張作霖，三民主義將獲勝，但演講中並無一句反宗教的話語。（Vincent Lebbe, 1928.8/9: 7）最令雷鳴遠印象深刻的是，整支軍隊對三民主義的忠誠之心有如宗教信仰般堅定。這種人民對於國家體制與命運的向心力，就好像美國人民對於美國憲法的信賴，和法國人民對 1793 年公布的〈人權宣言〉之尊重。雷鐸甚至思忖如何影響心中無耶穌和福音，只有孫文和三民主義的中國青年。他認為，應該可將這種愛國熱誠轉變為對基督宗教的信仰。（Vincent Lebbe, 1928.8-9: 7-8）

以蔣中正為首的南京國府終於在 1928 年 6 月 6 日克復北京，完成北伐。12 月 29 日東北易幟，中國終告統一。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想望實現了，雷鳴遠對中國天主教會的未來發展也充滿期待。雷鐸回到安國代牧區後不久，就成立了「公教進行會」（Action Catholique）的分會，結合當地教士和信徒的力量推動福傳事業。

為因應國家統一之後的新局勢，雷鳴遠主持會議討論往後該傳教區對於新政府應採取的立場。一開始與會人員提出三種可能性：

- 1) 或者我們加入國民黨，不僅為黨，也為天主教會的利益努力，同時也維持「公教進行會」的目標；
- 2) 或者我們與國府推動的建設國家運動劃清界線，自我侷限在象牙塔中；
- 3) 或者我們在與國府接觸時，仍舊保留我們原則的自由，特別是在國民黨政府的國家建設計畫與天主教精神和「公教進行會」宗旨相符時，給予協助。（Vincent Lebbe, 1928.12: 9）

與會人員進行討論時，立即排除第一選項；至於第二選項，咸認為那是一種面對選擇時表達「棄權」，是最糟糕的決定，也不加以考慮。會議討論結果決定同意第三選項，擔任指導員的神職提醒在場者，稱「公教進行會」

原則是不得參與政治，也置身於政治活動之外，也超越政治（Vincent Lebbe, 1928.12: 10）。成員在考量進行會與天主教會的原則，以及能力所及之各種因素後，決定以社會服務為方向，推動社會革新運動、成立夜間學校以解決文盲問題，也可藉此開設天主教理課程。（Vincent Lebbe, 1928.12: 10-11）

### 一、對中國未來之憧憬

國民黨推動的以三民主義為建國方針同樣引起雷和所有教徒的關心，他們討論三民主義與天主教義是否可相容，以及國府宣傳與實施三民主義所引發之問題。他們一致認為以三民主義內容來看，並無違反天主教精神，無歧視天主教之字句，也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然而，他們擔心的是可能會有心術不正之人藉三民主義為名，行反對天主教為實的活動。所以，教會應該請教徒多參與推廣三民主義相關活動，如遇到其他人員有反教傾向時，他們可及時溝通，也可隨時讓教會人士了解最新情況發展。（Vincent Lebbe, 1928.12: 11-12）

雷鳴遠深入研究三民主義，感受到南京國府對建立新中國的使命感和方法，首務即在於自我洗新革面，並灌輸愛國情操。他將三民主義和天主教精神做一融通，如「訓練自己視拯救他人為首要任務之前，必先使自己完善；當吾人有充足理由為任務犧牲，就已達到道德最高境界了。」再者，他也發現國民黨印製的三民主義宣傳小冊中，其問答方式與天主教教理問答如出一轍。（Vincent Lebbe, 1929.9-10: 228-233）

### 二、統一教育權對天主教學校之影響

他對於回歸統一的中國最關心的議題，除了宗教自由獲保障之外，還有國民教育的問題，因為教育內容關乎新一代對基督宗教的看法。早在1928年4月北伐勝利在望時雷鳴遠指出中國統一後，天主教學校就面臨威脅了，因為政府人員普遍反應出唯物主義式的世俗化、去宗教化、最激進的國家至上主義和國家教育統一化之傾向。（Vincent Lebbe, 1928.5: 4）雖然各地多少出現反基督宗教的氣氛，特別是政府與軍方人員，但是許多村鎮長和居民因為文盲率極高，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還是請求傳教士開設教會學校，或主持公立學校。地方政府有意願開設新學校，然而問題是其他學校已經拿走所有預算而缺乏財源，而且戰爭時期國家財庫枯竭，無力推廣教育。（Vincent Lebbe, 1928.5: 4-6）對天主教會而言，仍然有許多發展空間。

北伐統一後，南京國府欲收回教育權，頒布教育實施方針，確定教育宗旨就是三民主義的黨化教育。教會學校的課程內容須符合教育部規定，才能獲得政府對該校頒發畢業文憑的承認，且董事會與校長均為中國公民，宗教不得為必修課程，也不可強迫學生參加宗教儀式。（李華興，1997：774；張玉法，1995：487-489）新法規公布後，引起在華天主教學生的抗議，他們透過「天主教青年會」抗議國府剝奪家長為其子女安排在天主教學校接受教育的權利，也違反憲法和三民主義保障的宗教自由之基本民權；同時，他們主張在學校中可自由安排宗教課程和儀式。（*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1930.11: 587-589）但是天主教會方面的聲音終究被國府各方面大規模改革的宣傳所掩蓋，教會學校為了獲得政府承認，只能服從新法令，逐漸世俗化，這是雷對統一在國府之下的中國所出現的反天主教教育現象表達的憂慮。

## 陸、戰火又起

中國因軍閥相互征戰和北伐軍事行動期間，軍士和平民死傷無數。宣化地區一帶無醫院，也缺醫護人員，距離最近的醫院在大同，猶需數小時火車車程，在等待運送至大醫院之前，傷患只能暫時被安置在火車站旁的酒館中，或是躺在戰地中乏人照護，通常等待運送醫療時間長達數天。代牧趙懷義（1880 -1927）感到不忍，對信徒發起組織護理志工人員之活動，將傷患從戰火前線運送至車站，雷鳴遠也參與，並擔任醫療志工隊隊長。（*Vincent Lebbe*, 1927.12: 15-16. 書信日期 1927/11/10）這是雷鳴遠醫療福傳行動的開端。雖然雷鳴遠較欣賞南京國府軍隊，對一些軍閥軍隊的評價並不高，特別厭惡奉系張作霖的軍隊搶奪教堂和平民財產之行為，但是他和志工醫療隊伍仍救助奉軍受傷官兵。（*Vincent Lebbe*, 1927.12: 19. 書信日期 1927/11/10）他們救護對象並不限於特定軍隊，因為他們基於天主教博愛之大原則，排除政治派系之考量，關心的是人的生命，對象都是中國人。

### 一、組織醫療救助工作

北伐完成後，日本並不願看到中國統一後國勢增強，於 1931 年發動「九一八事變」。雷鳴遠見中國處境危急，戰火傷患爆增，決定從事愛國行動。首先，他在數個月期間，每晚都聚眾討論如何救國，成員最後確定了成立團隊從事戰爭傷患的醫療照顧為目標之後，以 1928 和 29 年先後在河北安國成立的「耀漢小兄弟會」（法語：Congrégation des Petits Frères de Saint-Jean-Baptiste，英語：Congregation of Saint John the Baptist）和「德來小姊妹會」（Les Petites Soeurs de Sainte Thérèse de l'Enfant Jésus）為基本班底，再至他地徵求志願者加入。之後，雷在馬相伯（1840-1939）的建議下尋求馮玉祥的支持。馮氏雖然對雷表示非常樂意協助，但 1932 年，日本發動「一二八」淞滬戰爭，直到三月中旬，馮氏並無進一步消息，雷心急如焚。於是，他在友人引薦下認識了國軍朱慶瀾（1874-1941）將軍，日後他對雷鐸的醫療隊多方援助。（Anonymat, 1933.7-8: 715-716）<sup>10</sup>

1933 年初，日軍向華北熱河擴張，爆發「長城戰役」。雷鳴遠加緊組織工作，在宣化、高陽一帶招攬志願者。為了組織一個勇敢但甘冒生命危險的志願醫療團體，他提出願加入者應事先同意四個條件：

- 1) 每位志願者所屬的村鎮長者提出該人品格保證，由該長者負起全責；
  - 2) 獲徵選者家屬所有成員同意出發任務；
  - 3) 志願者身體強健；
  - 4) 一旦志工死亡，其家屬承諾不要求賠償金，也不要求取回遺體。
- （Anonymat, 1933.7-8: 718-719）

以上的條件都是志工本人和其家屬為博愛精神和愛國情操所做的完全奉獻與犧牲，也不限宗教信仰。從 3 月 16 至 20 日五天時間就已組成一支約 220 人的醫療隊，始終受缺乏醫護人員問題困擾的國軍將領對此效率感到驚嘆不已。（Anonymat, 1933.7-8: 710, 718-719）雷鐸帶領的志工醫療隊伍在紅十字會協助下立即投入救護工作。

此外，雷鳴遠與軍方達成協議如下：

---

<sup>10</sup> 轉譯自《益世報》北京版，1933 年 3 月 23 日。



- 1) 安國救護隊將被派到前線最危險的地方，或其他人不願前往的地方；
- 2) 軍方不得將救護隊切分為數個小組削弱整個團體的效率；
- 3) 雷鳴遠獲同意指揮志願醫療隊。（Anonymat, 1933.5-6: 669-670）

雷鳴遠的醫療隊始終追隨國軍抗日行動進行救助工作，全國名聲顯揚。1934年3月10日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將軍成立一座傷兵院，任命雷鳴遠為主任。（Vincent Tcheou [trad.], 1934.5-6: 884）

醫療隊由雷鐸帶領，建立一套制度維繫隊伍內部之運作和進行醫療救助之外的活動。新招募的隊員由幹部「耀漢小兄弟會」修士訓練，整支抬擔架志工隊伍分為三支隊，每支隊由四個抬擔架小組組成。而每個抬擔架小隊會有四位隊員，因為活動距離遙遠，所以須四位隊員負責一個擔架。隊員大多是畢生從未離鄉的農民，所以須要加以適當訓練。在工作之餘，則由修士負責帶領隊員祈禱和教理講授，紮營地點也成為彌撒和開會用途。雷鳴遠得意地說：「修道生活一點都不缺」。許多原本非教友的隊員和士兵軍官耳濡目染而入教；醫療隊極受軍隊尊敬，甚至修士的修道服裝也成為受歡迎的衣著，服裝風潮還流傳到其他軍團（Vincent Lebbe, 1939: 27-30）。（圖5）

## 二、抗日又反共

自「九一八事變」開始，日軍侵華攻勢從華北經華中，延伸到東南沿海。國府考慮到共軍在內地武裝動亂，使國府腹背受敵，在軍力有限之情況下，決定「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全力掃蕩共黨游擊隊，對日軍的嚴厲攻勢只採消極抵抗。但這政策在1936年12月發生「西安事變」後有了改變，國府停止剿共，將共產黨軍隊納入國軍，共同抗日。雖然名義上是國共共同抗日，但是共軍卻趁機奪取國軍管轄地區，快速吸收新成員壯大實力，也偷襲國軍部隊。

1937年爆發「七七事變」，在日軍猛烈砲火之下，國軍傷亡慘重。雷鳴遠親率醫療隊入戰場進行救護工作，由河北盧溝橋至保定，再轉到太行山。國軍將領為了便於行事，將醫療隊改編為一個衛生連，直屬該軍，由雷氏出任連長負責救護工作。中日兩軍在娘子關附近激戰，衛生連救護傷兵達三千之眾，贏得全軍將士讚揚，而尊稱雷為「傷兵之父」（李郁塘，1977: 152-153）。

雷鳴遠醫療隊的義行傳遍全國，蔣中正也有耳聞而想認識這位傳教士。1938 年蔣氏在漢口會晤雷氏，蔣氏希望支助雷氏到全世界宣傳中國情勢，以對抗日本鋪天蓋地宣傳日本在中國軍事行動的目的是為抵禦共產黨的擴張之謬論。但是雷氏表示他因「老西開」事件而使西方國家視他為敵人，他希望能與中國朋友共赴前線。自此，兩人成為好友，蔣於 1938 年 10 月 1 日授權他組織「華北戰地督導民眾服務團」（李敦宗，1977：156），蔣中正則將在國際宣傳中國抗日情況的任務交給南京主教于斌。（陳聰銘，2018：77）雷鳴遠之所以堅持留在中國，主要原因除了他在西方國家外交圈不討喜之外，或許認為中國戰況日緊，傷患激增，醫療隊需有人領導，且可與他的中國朋友共患難。

雷鳴遠帶領醫療隊上前線的消息經國際媒體報導而為世人所知，也被人謠傳為被國府晉升為將軍，並統率軍隊拿武器殺敵。雷氏感覺受委屈，寫信向他在比國修院團體修道的弟弟貝德（Dom Bède）<sup>11</sup>抱怨，也澄清他在醫療行動的作為和角色。他說他知道教會法的規定（陳聰銘，2018：67-90），無論危險如何，他和修士都不戴武器；他之前才因一位修士在一段極危險路程中不願服從，又持一把左輪手槍，而決定辭退他（P. Goffart et A. Sohier, 1948：307，書信日期 1939/9/20）。1933 年 5 月 5 日雷和醫療隊到北京運送傷患，路經輔仁大學和宗座代表公署，代表秘書安童儀（Ildebrando Antoniutti, 1898-1974）尚出來向隊伍打氣致意，感激他們的善行（Vincent Lebbe, 1933.7-8: 731，書信日期 1933/5/5）。1939 年 5 月雷氏還告知宗座代表蔡寧（Mario Zanin, 1890-1958）醫療隊的活動，和 9 位隊員捐軀，6 位受傷之消息（P. Goffart et A. Sohier, 1948: 299. 書信日期 1938/2/1）。是以，教廷和駐華宗座代表對雷氏和醫療隊之行動完全知情，且絕對支持。

1939 年 3 月 14 日蔡寧向所有傳教區發布了〈既不偏右，也不偏左〉牧函，要求所有教士在戰時採中立態度。這引發國民政府和所有國籍教士與教徒的不滿（陳聰銘，2016：156-158），雷鳴遠將此牧函拋諸腦後，依舊投入醫療工作。蔡寧於重慶遇見雷鐸，蔡說：「您做得很好，您做得很好。」（趙雅博，1971：170）對蔡寧而言，雷氏的督導團只從事醫護救助人道工作，並無違反教會規定與他發出的牧函。

---

<sup>11</sup> 原名 Adrien Lebbe, 會名為 Dom Bède de Maredsous, (1888-1948)。

在進行救援的活動中，雷鳴遠看到義大利傳教士在他們主持的教堂外掛上義國國旗，也發現這些傳教士不鼓勵信徒參與愛國抗日行動。他認為義國在中國抗戰時期已成為軸心國一員而被視為敵國，所以義國傳教士所為不僅置教堂於險境，還使中國教會和教民被廣大人民質疑愛國心。於是，雷氏寫信向蔡寧指陳此問題，並說如果義國傳教士真愛他們祖國，就應該回國，如同義國參與軸心國後，中國政府內的義國顧問就打道回國了。（P. Goffart et A. Sohier, 1948: 297-298. 書信日期 1938/2/1）

雷鳴遠早對共產主義對人心不良影響有所警戒，當他在各地從事醫療救助工作時，他有許多機會接觸共產黨員。他們得知雷鳴遠和其他教徒在傳教區，如一般人民過清貧的生活，辛勤工作，也幫助其他貧困家庭，在當地人民中享有極佳的聲譽而深表讚賞。雷氏雖然反共，但態度並不如國民黨人般激烈，也與共黨人士維繫一種特殊關係；在一些共黨人士心目中，雷氏是與其他傳教士不一樣的西方人，也為他贏得許多共黨人士的友誼和尊敬，例如朱德（趙雅博，1971：177-179），因而他所屬的傳教區有時可避開一些共黨份子的攻擊。一般而言，醫療隊都盡量避開共黨控制的區域以免招惹麻煩。雷鐸依然相信雖然天主教和共產主義水火不容，能在救國的大纛下合作（趙雅博，1971：178），但終究期待落空。

華北督導團為了在華北各地展開工作，乃成立六個工作隊，並劃定工作地區，含括從河北平原到山西高原之間的太行山區、晉中太岳山區、晉南中條山區、豫西到魯南等廣大地區（李敦宗，1977：157），督導團在戰場上與共軍相遇是無法避免的事。1940年2月督導團經太行山北進，該地區雖有國軍駐守，但共軍為了設置「晉冀豫魯邊區」，也進駐該山區。3月9日在一場國共內戰中，他和其他19名醫護隊員修士在河北姚村遭共軍俘虜，其中12名修士立刻遭處死，另7名病弱被囚禁獄中。在重慶國府與共軍談判下，雷鳴遠於4月16日獲釋。但已因肝腎臟器衰竭病入膏肓，於24日在重慶逝世，26日安葬在重慶歌樂山。（李敦宗，1977：157-160）

7月18日國府頒布褒揚令，11月29日設於重慶的法比瑞同學會舉行追悼會。會中冠蓋雲集，光是列名的發起人數就達66人，除了教會中人陸徵祥和吳經熊之外，都是國府重要人士和高階將領。會中輓聯無數，其中方豪神父所寫，言簡意賅：

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業。

是異國容顏，懷中國心腸（方豪，〈附錄（四）雷鳴遠司鐸雜憶〉，趙雅博，1971：243-246）。

精簡數語完全涵蓋雷鳴遠在華福傳歲月與精神，他的志業至今眾人傳頌不已。台北的忠烈祠中，也安置他的一方牌位供人瞻仰。

## 柒、雷鳴遠對中國天主教會之貢獻與影響

雷鳴遠的政教觀形成於中國內憂外患之中，隨著中國在各階段政爭與戰禍中塑造成反共、抗日、擁蔣與愛中國的四項特徵，他帶領的醫療隊吸引的青年男女，同樣也認同這些價值觀。雷鳴遠常在他的書信中提到醫療隊伍在前線如何日夜在槍林彈雨中搶救傷患，無數次與死神擦身而過。他們都早已置生死於度外，因為所有志願者，包括雷氏本人，都在參與醫療隊之前就簽下同同意書，準備隨時為國捐軀，的確也有不少隊員死於任務之中！許多見證雷鐸和醫療隊視死如歸義行的國軍將士都大受感動，而願意領洗為天主教徒（Vincent Lebbe, 1927.12: 16-18）。

### 一、 共赴國難的中國教會培養未來國家與教會人才

過去雷鳴遠在歐洲影響了許多留學生，這些留學生同樣也認同上述四項特徵，他們學成歸國後大多在工作崗位上有極高的成就。許多成為國府官員、專業技術與高等教育人員，不少人成為熱心的天主教徒（André Boland, 1931.8-9: 221-222; Anonymat, 1932.6 : 467），如：1920年三位陪同雷氏前往法國的學生之一的王育三，學成歸國後服務於《益世報》；另一位學生楊安然（Dom Thaddée Yong Ann-yuen）則成為中國首位本篤會士（Anonymat, 1931.1 : 31-32 ; Jean Tsao, 1932.11-12 : 540-541）。<sup>12</sup> 還有許多參與醫療隊的隊員，往後他們將成為建設國家的棟樑，擔當大陸、台、港、澳各地天主教會的主幹，比如：抗日期間在國軍將領麾下擔任參謀的尹國祥（1910-?）與雷氏有所接觸，深受對方犧牲奉獻的熱誠感動而接受天主教信仰（尹國祥，1977 : 146），尹氏日後官至少將，來臺後1968年退役，積極投入推動臺灣天主教會傳教活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尹國祥先生訪問記

---

<sup>12</sup> 第三位學生 Bernard Liou 於 1921 年病逝布魯賽爾。

錄》)。<sup>13</sup> 查良釗（1897-1982）第一次遇見雷鳴遠，適逢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中，雷氏在天津組織「紅十字會救護隊」救助傷患，查氏接受短期救護訓練。之後，查氏又於1933年的「長城戰役」和1937年「七七事變」，多次參與雷氏組織的救護工作（查良釗，1977：100-104）。查氏赴臺後從事教育與慈善活動，卓有成就。雷鳴遠創立的耀漢小兄弟會也培養出多位優秀國籍教士，如：擔任雷氏秘書、情同父子的曹立珊（1913-2011）在雷氏逝世後接任修會總會長。他先後在香港和臺灣創辦、主持天主教學校，著作頗豐。曾擔任台北總主教的賈彥文（1925-2017）在1937年還是小修生時，曾遠遠地見過雷鐸，不曾直接接觸。但賈氏在1951年晉鐸學成之後，前往比利時，住在雷氏創辦的「魯汶中國學生之家」，擔任輔導學生的工作，又負責「鳴遠獎學金委員會」之運作事宜（賈彥文，1977：82-85），培植青年學子無數。

## 二、與特定政權緊密合作的後遺症？

雷鳴遠在1927-1940年這段期間的醫療福傳行動，結合了華北天主教會的力量，協助以蔣中正為首的國軍抗日，也建立了中國教會和國民黨政府之間在以救國的前提下，展開緊密合作關係之基礎。事實上，教會方面也絕非只有雷鳴遠一人積極支持後者，尚有自1937年後在國際上奔波宣傳，以南京主教于斌（1901-1978）為首的國籍教士。而這種緊密合作關係在雷鐸去逝後由于斌持續並深化，延伸到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北之後。是否雷鳴遠與國民黨政權關係過於密切，導致教會成員在戰時成為共產黨攻擊的對象？支持此觀點的例證就是與雷氏同遭共軍虜獲的醫護隊員中，有12名修士遭處死。「華北戰地督導團」逾六年期間（1938-1945），共犧牲二百餘人。其中，死於共黨者達三分之一，包含修士與修女，另有與醫療團共同行動的軍統局人員也有多人捐軀（李敦宗，1977：160）。

當雷氏遭虜時，共軍也曾嘗試勸服雷氏轉而支持共軍，稱雷為神職人員，且屬西歐國籍，不宜參加中日國際戰爭，要傳教佈道也宜到大後方，但雷氏回應：

---

<sup>13</sup> 摘錄時間 2021/5/20,  
[www.mh.sinica.edu.tw/PGPublication\\_Detail.aspx?tmid=3&mid=61&pubid=359&majorTypeCode=1&minorTypeCode=3&major=1&minor=3](http://www.mh.sinica.edu.tw/PGPublication_Detail.aspx?tmid=3&mid=61&pubid=359&majorTypeCode=1&minorTypeCode=3&major=1&minor=3)

救國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前方後方，我早已入籍成為中國人，尤且籍屬河北省，在平、津、保（定）傳教四十年。因而我要率部還鄉救國，才能發揮雙倍的力量，你們都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理應幫助我才對，何能阻止我呢？（李敦宗，1977：160）

共軍見雷氏以救國為目標，意志堅定，卻也無可奈何。

從上述話語和醫療隊的實際行動看來，他們的目標是抗日。雷鳴遠在招募新成員時，也只以抗日和愛國為號召（Anonymat, 1933.7-8: 718-719; 趙雅博，1971：160-161），在長城抗戰時，他也曾救過一位共黨青年，當後者逃脫時，留了一信給雷氏，表示說：「您的天主教不同於別人的天主教」。（趙雅博，1971：175）至於醫療隊員被共軍虜獲殺害者，是否導因於雷鳴遠與蔣中正國府關係匪淺使然？宗座代表剛恆毅 1922-33 年駐華期間也觀察到共黨在鄉間騷擾基督宗教教堂，多位天主教傳教士被殺或勒贖事件不時傳出（Celso Costantini, vol. 2, 1946：323-330），<sup>14</sup>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雷鳴遠去世以後，共黨分子以天主教徒為攻擊對象眾所周知。共黨以國民黨軍隊政府為敵，對後者的支持者的處置都極嚴厲，不論共軍在軍事行動中殺害天主教徒或神職，或是因為後者協助國府軍隊而決定加害，筆者認為這應都是成因，但不認為他們的殉身是遭雷鳴遠的政治立場所拖累。關鍵問題是：擁蔣氏的健將雷鳴遠何以不被共軍殺害，得以獲釋後在國府的照料下辭世？如果共軍因雷鳴遠之故殺害其他 12 位修士，何以不殺害這些修士的領導者？這可推論出共軍因這些修士協助國府軍隊而痛下殺手，筆者研判雷之所以得免遭殺害，是因為他與幾位共黨將領維持的個人友誼發揮了作用。而每位自願者在參與醫療隊之前，都完全了解任務之危險性，隨時可能喪命，但是他們都已簽下生死同意書，他們也視為國捐軀是光榮之事，不見戰後倖存者怪罪雷鳴遠害其他人喪命。

---

<sup>14</sup> 日記日期為 1932-33 年間華中地區。

### 三、政教之分野與極限

雷鳴遠的政教觀和行動引發的另一層面的問題，在於一方面，教廷時常告誡傳教士不得干預當地的政治，如：1919年發布的《夫至大》宗座文書（*Benoît XV. (1919), "Apostolic Letter 'Maximum illud'"*）<sup>15</sup>；另一方面，天主教會也嚴禁神職人員持武器參戰（Thomas d'Aquin, 1985: 281-282）。雷鳴遠引發的爭議在於他以傳教士身分，是否違反教會的規定支持並協助分裂政權的一方以軍事行動抵禦外敵，引起他是否持武殺敵之疑慮。

筆者以兩方面探討此問題，首先是宗座代表蔡寧於1939年3月14日發出的〈既不偏右，也不偏左〉牧函，令所有教士在戰時採中立態度，經國府向教廷抗議後，教廷國務卿馬里歐內（Luigi Maglione, 1877-1944, 1939-1944在職）澄清，謂該令乃針對外籍傳教士，且天主教徒有愛國與為國效勞之權利。（陳聰銘，2016: 156-158）雷氏已於1927年8月入籍中國，可算是國籍教士，可保衛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時，西方教會均設有隨軍司鐸制度進行軍隊牧靈，但是這些司鐸同樣不得佩戴武器。（陳聰銘，2018: 73）

再者，雷鐸時而向蔡寧說明醫療隊近況，蔡完全明瞭雷氏之所為，且當面鼓勵雷氏的醫療救助行動；雷氏也向蔡保證他本人與醫療隊隊員並無持武器。筆者在多筆參與或見證雷鳴遠和醫療隊行動之描述中，也未見雷氏持用武器之事，且國籍教士與教徒對雷氏的評價均為正面。在華傳教士大多不批評雷氏的戰地醫療行動，可能因為他們都目睹日軍的暴行，自己可能也成為戰火下的犧牲者。<sup>16</sup>然而，仍有少數的傳教士不喜歡雷鳴遠之言行，其中以法籍遣使會士倪神父（Henri Garnier）為代表人物。他於1928年出版《基督在中國》（*Le Christ en Chine*）批評雷鐸主張擢升國籍主教，也反對教廷對中國教會之改革方向，剛恆毅指斥倪有白人優越感，並向教廷報告此事，教廷禁止該書流通，倪服從剛代表之命離華回法國。（陳聰銘，2017: 101）但倪回國後，並不停止攻訐雷，1948和1951年他出版了 *Introduction à la vie réelle du Père Lebbe*（介紹雷鳴遠神父真實生活）上下冊，文中無提供任何實

<sup>15</sup> Access date 5/22/2021, [http://www.vatican.va/content/benedict-xv/en/apost\\_letters/documents/hf\\_ben-xv\\_apl\\_19191130\\_maximum-illud.html](http://www.vatican.va/content/benedict-xv/en/apost_letters/documents/hf_ben-xv_apl_19191130_maximum-illud.html)

<sup>16</sup> 如1937年10月9日日軍欲強迫在河北正定教堂避難的數百名婦女充為慰安婦，荷蘭籍主教文致和(Frans Schraven, 1873~1937) 予以拒絕，日軍將文致和與其他8位不同國籍傳教士與外籍教徒活活燒死。（陳聰銘，2021: 29）

證，只針對雷反對法國保教權言行和《益世報》人員的廉潔大加批判，並無批評雷在抗戰中的政治立場和醫療隊相關議題。（Henri Garnier, 1<sup>re</sup> Partie, 1948 ; H. Garnier, 2<sup>ème</sup> Partie, 1951.）

剛恆毅在代表任內對雷氏讚譽有加（Celso Costantini, vol. 2, 1946 : 397-398），剛氏回教廷擔任傳信部秘書長後，教廷和剛氏也必定知曉雷氏之行動與政治立場；同時，雷鳴遠反共之言行也合乎教廷自 19 世紀末至 1940 年<sup>17</sup>為止反共基本立場，雷氏反共又表態支持國民黨右派的蔣氏主持之國府，在當時時空看來也自屬理所當然。

## 結論

雷鳴遠初到中國的時代是中國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掠奪下的犧牲者，拳亂是清廷與人民對列強欺壓的反撲，辛丑和約是中國戰敗後國恥之標記。人民對西方列強的仇恨，並不隨著清朝的覆亡而消失。共和肇始，知識份子和社會菁英開始意識到國家富強建基在民主與科學，也就是現代民主政治制度和新式完善的教育體制；另一個能凝聚中國人民向心力因素就是愛國情操。

雷鳴遠深切地感受到中國人民對國家命運之期待，也了解天主教徒的愛國心遭教外同胞質疑，所以他在天津「老西開」事件中挺身保護中國權益，抵禦法國無理索求。他在這事件中，得到了全中國人民的肯定和信賴。在北伐完成後，他也觀察到社會一般民眾和國民政府人員都還普遍地表現出一股排外和反教氣氛，在城市中許多牆壁上都寫上「消除所有不平等」的標語，雷鳴遠認為這股排外情緒會造成中國人民反對基督宗教之結果，所以中國天主教迫切解決的問題，就在於使民眾相信天主教與帝國主義列強無任何關係。（Vincent Lebbe, 1928.10: 30）他的方式就是將中國視為己國，以身作則向中國人表明天主教和愛國可以並行不悖。

雷鳴遠對中國命運的關心程度，可從他對政治與社會現況發展密切關注看出一斑，不論是他身在歐洲還是中國。當他回到中國後，國家正處於戰亂中，他鼓勵教友投入抗戰救國，但他身為神職人員，觀察到醫療人員與物資奇缺，這正是中國的需要，也是天主教會可做出的貢獻。他和醫療隊救援對象並不分政治派系或思想主張，不論軍閥或國軍，甚至他厭惡的共產黨員

---

<sup>17</sup> 教廷針對中共之立場，延續至 1949 年為止。



也都是他們救助醫療的對象（趙雅博，1971：175），只要是中國人，他們不分對象，<sup>18</sup>因為他的救護隊行動以天主教博愛的精神為本。

雖然雷鳴遠和他的醫療隊堅持以救人為先，不顧對象政治立場為何，但是雷鐸對於政治陣營和人物還是有所選擇，以確定他欲支持的對象。綜合他的書信和言談紀錄，吾人可知他衡量標準在於是否關心人民生活福祉、支持宗教自由、公平對待天主教會，以及反對共產主義。在觀察評估了當時政壇人物與不同政權的作風和政策之後，他對於蔣中正所代表的南京國府寄予厚望，醫療隊的運作也就配合該政府指揮的國軍軍事行動為主，而非國民黨的左派或汪精衛的武漢國府，更非共黨游擊隊或軍閥。

雷鳴遠的政治觀和所做的政治選擇，不僅對他服務的傳教區和醫療隊相關人員產生影響，也透過他的書信，影響到在比利時發行的《中天青報》和歐洲其他書報雜誌讀者。筆者匯整了《中天青報》中的中國留學生所撰寫的多篇文章，可得知雷鐸、該刊主編（雷氏之好友包朗和一位留學生），以及其他留學生作者（不一定全都是天主教徒）都散發著相同的價值觀與特徵：支持國民黨右派政府和蔣中正、擁護三民主義、反共產主義、高度愛國情操、反日本侵華戰爭，且是熱誠的天主教徒，或至少對天主教會友善者（Alexandre Tsung-ming Chen, 2020: 244），他的醫療救護隊成員也同樣具備這些特質，雷鐸並不強迫醫療隊員接受天主教信仰，但是大多數最後都自願成為教友。雷鳴遠留給後世的遺產不僅突破時間的限制，橫跨地理空間的藩籬，也以基督博愛的精神擁抱不同政治思想主張者。在此，吾人可確定雷鳴遠已領悟了如何將中國人尊敬的孫文和支持三民主義的忠誠心，轉換為敬愛耶穌基督和《聖經》的門徑，那就是大公、無私、無我的愛國心。

雷氏對中國天主教會的影響，是鼓勵國籍教士和教徒以實際行動參與救國行動，將愛國情操緊密地與天主教信仰契合。此一政教關係熔鑄於國家政權面臨危機時，他逝世後，于斌延續此關係至1949年以後國共對峙的脈絡中，塑造另一種面貌的政教關係，此為後話。雷鳴遠醫療福傳行動的時代意義，在於使中國天主教會在抗日衛國的行動中不缺席；同時，1920-40年代反基督思想潮流高漲時，有助於知識份子和政府官員改變對天主教的負面觀感。

---

<sup>18</sup> 雷鳴遠在書信中，並沒提到醫療隊是否也救助日軍傷患。

這對國府在整合全國民心，全面抗日終獲成功的時代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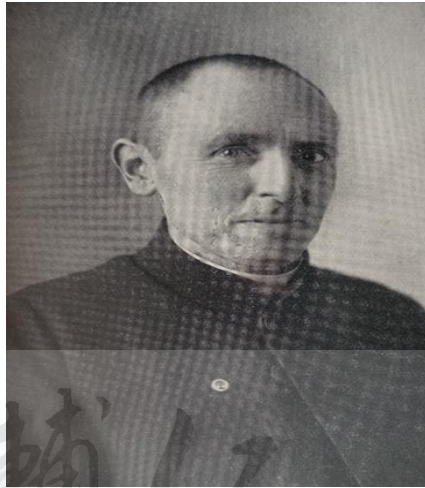


圖 1：雷鳴遠(Vincent Lebbe)<sup>19</sup>



圖 2：十九世紀末之反教漫畫（Anonymat,1900: No. 2996: 52-1.）

<sup>19</sup> 圖片來源：Lebbe, Vincent（1930）. *En Chine il y a du nouveau. Le Père Lebbe nous écrit*. Belgique/Liège : La Pensée Catholiqu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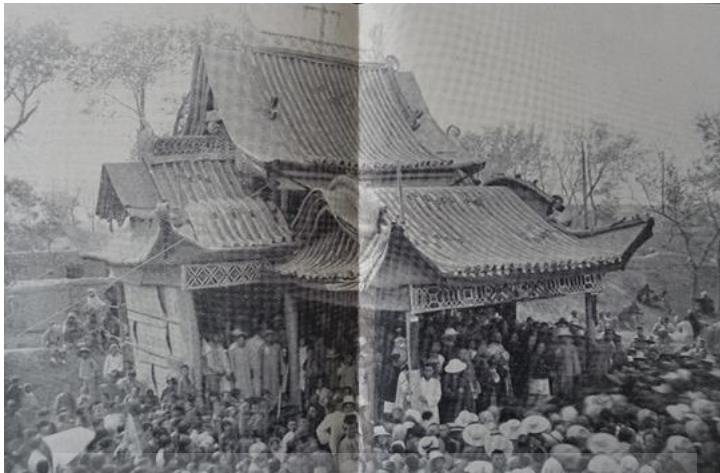


圖 3：雷鳴遠宣教場景(Vincent Lebbe, 1930 :48.2)



圖 4：1927年初魯汶中國書院學生朋友向雷鳴遠送別  
(Vincent Lebbe, 1930 : 48.1)

## 參考文獻

- Congregation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77). Vincent Lebbe, 1877-1940/Lei Ming Yuan, 1877-1940, he Little Sisters of St. Theresa of the Child Jesus(Ed). Taipei: he Little Sisters of St. Theresa of the Child Jesus.
- Zhang, Yüfa (1995).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Zhongguo xiandai shi,(2).Taipei: Tunghua Publishers.
- Chen, Sanjing (2013). *The Movement of Making Studies in Europe: The Ideal of Fusing the Worldwide Learning Sciences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an Years/Lü Ou jiaoyu yundong: minchu ronghe shijie xueshu de lixiang*.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 Chen, Tsung-ming (2016). *Sino-Vat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Vatican Relations with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1912-1978]/Zhongfan waijiao shi: liang an yu jiaoting guanxi [1912-1978]*. Taipei: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 Chen, Tsung-ming (2018). Study on the Opin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Pope Pius XII and Mgr. Yu Pin Regarding Just War and Patriot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Sino-Japanese War/Jiaozong Bihu shier shi yu Nanjing zhujiao Yu Bin dui “zhengyi zhi zhang” yu “ai guo” de kanfa yu shijian,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45,12 :67-90.
- 天主教耀漢會、德來會編（1977）。《雷鳴遠，1877-1940》。台北：同編者。
- 王慶餘(2011)。《留比學生史》。台北：光啟。
- 尹國祥（1977）。〈我所知道的雷鳴遠神父〉，《雷鳴遠，1877-1940》。台北：天主教耀漢會、德來會，144-145。
- 呂實強主編（1974）。《教務教案檔：同治十年—光緒四年》，第3輯第1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 李郁塘（1977）。〈中國基督雷鳴遠神父〉，《雷鳴遠，1877-1940》。台北：天主教耀漢會、德來會，151-155。
- 李敦宗（1977）。〈雷鳴遠神父與我〉，《雷鳴遠，1877-1940》。台北：天主教耀漢會、德來會，156-161。
- 李華興（1997）。《民國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沈雲龍（1981）。《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 查良釗（1977）。〈雷鳴遠神父與我〉，《雷鳴遠，1877-1940》。台北：天主教耀漢會、德來會，100-105。
- 張玉法（1995）。《中國現代史》，下冊。台北：東華書局。
- 陳三井（2013）。《旅歐教育運動：民初融合世界學術的理想》。台北：秀威資訊科技。
- 陳聰銘（2016）。《中梵外交史—兩岸與教廷關係 [1912-1978] 》。台北：光啟。
- 陳聰銘（2017）。〈從光若翰巡閱使的報告看國籍教士地位與擢升國籍主教之問題〉，《哲學與文化》，第44卷，第11期：頁83-108。
- 陳聰銘（2018）。〈教宗庇護十二世與南京主教于斌對「正義之戰」與「愛國」的看法與實踐：在中國抗日戰爭之脈絡〉，《哲學與文化》，第45卷，第12期：67-90。
- 陳聰銘（2021）。〈法國保教權對中國天主教會本土化之影響：問題與解決之道〉，《中國大陸研究》，第64卷，第1期：21-55。
- 賈彥文（1977）。〈雷鳴遠神父的感召〉，《雷鳴遠，1877-1940》。台北：天主教耀漢會、德來會，82-87。
- 趙雅博（1971）。《烽火中的雷鳴遠》。台北：雲天出版社。
- 〈近事：本國之部〉（1917. 10）。《聖教雜誌》，第6卷，第10期：300-301。
- Anonymat（1900）。Le nationalisme en Chine, *L'illustration*, Tome 58, No. 2996: 52-1, 52-2.
- Anonymat（1931. 1）。Pour mieux servir le Seigneur. Départ de l'abbé Jacques Wang,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73: 31-32.
- Anonymat（1932. 6）。Nouvelles des nôtres,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90: 464-470.
- Anonymat（1933. 5-6）。Le P. Lebbe part sur le front chinois,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101-102: 669-670.
- Anonymat（1933.7-8）。Le Père Lebbe part pour le front,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103-104: 714-721.
- Boland, André（1927. 3）。Entre nous,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27: 2.

- Boland, André (1931. 8-9) . À propos des tendanc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Chine moderne,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80-81: 220-223.
- Chen, Alexandre Tsung-ming (2013) . Les réactions des autorités chinoises face au protectorat religieux français au cours du XIXe siècle. In Alexandre Tsung-ming Chen (Ed) ., *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Évangélisation et Conflits* ( pp. 125-171 et 285-297 [appendice] ) . Belgium/Louvai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 Chen, Alexandre Tsung-ming (2015) . The French Catholic Protectorate in China from 1900 to 1911: Latent Evaluation and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I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ed) ,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From its Beginning to the Scheut Fathers and 20th Century. Unveiling some less Known Sources, Sounds and Pictures* ( pp. 83-297 ) . Belgium/Louvai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 Chen, Alexandre Tsung-ming (2020) . Vincent Lebbe et les étudiants chinois en France et en Belgique de 1920-1940. In Emilie Gangnat, Anne Ruolt et Gilles Vidal (dir.) , *Enfance, jeunesse et Missions chrétiennes (XIXe-XXIe siècle)* ( pp. 233-249 ) . Paris: Karthala.
- Chih, André (1962) . *L'Occident "chrétien" vu par les Chinois vers la fin du XIXe siècle (1870-1900)* .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Costantini, Celso (1946) . *Con i missionary in Cina (1922-1933)* . *Memorie di fatti e di idee*, vol. 2, Roma: Unione Missionaria del Clero in Italia.
- d'Aquin, Thomas (1983) . *Somme théologique*. Tome 3. Paris : Les Editions du Cerf.
- Garnier, Henri (1948) . *Introduction à la vie réelle du Père Lebbe*. Première partie. France/Dijon: Imprimerie Bernigaud et Privat.
- Garnier, Henri (1951) . *Introduction à la vie réelle du Père Lebbe*. Deuxième partie. France/Dijon: Imprimerie Bernigaud et Privat.
- Goffart, Paul et Albert Sohier (Choix et présentation) (1960) . *Lettres du Père Lebbe*. Tournai, Belgique: Casterman.
-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1930. 11) . Les décrets antichrétiens de Nankin,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71: 587-589.

- Lebbe, Vincent (1925. 7-8) . La Jeunesse Universitaire Chinoise. La 'Marée' franco-belge, *Bulletin des Missions*, 10: 314-320.
- Lebbe, Vincent (1927. 10-11) . Lettre du Père Lebbe,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34-35: 8-9.
- Lebbe, Vincent (1927. 12) . Sur la ligne de feu,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36: 12-19.
- Lebbe, Vincent (1927. 6) . Deux lettres du Père Lebbe,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30: 4-9.
- Lebbe, Vincent (1927. 7) . Trois lettres du Père Lebbe,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31: 5-12.
- Lebbe, Vincent (1928. 10) . Une confirmation des lettres du Père Lebbe,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46: 28-30.
- Lebbe, Vincent (1928. 12) . Lettre du Père Lebbe,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48: 6-13.
- Lebbe, Vincent (1928. 3-4) . Lettre du Père Lebbe,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39-40: 6-9.
- Lebbe, Vincent (1928. 5) . Lettre du Père Lebbe. Le Blé qui lève,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41: 4-11.
- Lebbe, Vincent (1928. 7) . Lettre du Père Lebbe,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43: 5-15.
- Lebbe, Vincent (1929. 9-10) . Lettre du Père Lebbe,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57-58: 225-233.
- Lebbe, Vincent (1930) . *En Chine il y a du nouveau. Le Père Lebbe nous écrit.* Belgique/Liège : La Pensée Catholique.
- Lebbe, Vincent (1933. 7-8) . Le P. Lebbe raconte son séjour au front,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103-104: 721-733.
- Lebbe, Vincent (1939) . Nos cloîtres dans la tempête, *Les Monasères du Père Lebbe*, présenté par C. Renirkens, Louvain: Editions SAM: 26-31.
- Levaux, Léopold (1948) . *Le Père Lebbe. Apôtre de la Chine moderne (1877-1940)* . Bruxelles/Paris :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 Soetens, Claude (1982). *Recueil des archives Vincent Lebbe*. – Vol. 1. La visite apostolique des missions de Chine 1919-1920. Belgique/Louvain-la-Neuve : Publications de la Faculté de Théologie Louvain-la-Neuve.
- Tan, J. M. (1927. 3) . L’Adieu,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27: 9-12.
- Tcheou, Vincent (trad.) (1934. 5-6) . Inauguration de l’Institut de rééducation et dispensaire pour invalides,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113-114: 884-887.
- Tsao, Jean (1932. 11-12) . La fête du premier bénédictin chinois à Louvain,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hinoise*, 95-96: 541-543.
- Young, Ernest P. (2013) . *Ecclesiastical Colony. China’s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French Religious Protectorate*.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網路資料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尹國祥先生訪問記錄〉，摘錄時間 2021/5/20，  
[www.mh.sinica.edu.tw/PGPublication\\_Detail.aspx?tmid=3&mid=61&pubid=359&majorTypeCode=1&minorTypeCode=3&major=1&minor=3](http://www.mh.sinica.edu.tw/PGPublication_Detail.aspx?tmid=3&mid=61&pubid=359&majorTypeCode=1&minorTypeCode=3&major=1&minor=3)
- Benoît XV. (1919) . “Apostolic Letter ‘Maximum illud’”, acces date 5/22/2021, [http://www.vatican.va/content/benedict-xv/en/apost\\_letters/documents/hf\\_ben-xv\\_apl\\_19191130\\_maximum-illud.html](http://www.vatican.va/content/benedict-xv/en/apost_letters/documents/hf_ben-xv_apl_19191130_maximum-illud.html).

#### 檔案、史料

- Archives Archiépisopales à Maline, Belgique (AAM) :  
- *Fonds Mercier*, vol. 22, China zaak Lebbe 1917- 1925.
- Archives du monde catholique*, ARCA, Louvain-La-Neuve, Belgique (LLN) :  
- *Archives de Vincent Lebbe*, D45.



## **The Observation of Catholic Missionary Vincent Lebbe on Republican Politics and His Medical Evangelization (1927-1940)**

**CHEN Tsung-Ming**

**Research Fellow at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Leuven, Belgium.**

### **Abstract**

Vincent Lebbe (1877-1940), a Belgian missionary, entered the French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the Lazarist) with a strong will of being dispatched to an overseas mission. His superior sent him to the Beijing Mission in 1901. The problem he encountered then was that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enjoyed prerogatives from the French Catholic Protectorate; this fact gave an impression that the Catholic faith served as an instrument of the Western colonial powers in the ey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Vincent Lebbe, this negative image impeded the propagation of Catholicism in the country. Consequently, he advocated the transfer of the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Missions from the missionaries' hands to the native clergy. He claimed perfect compatibility between patriotism and fidelity to the Catholic faith.

His claim did not receive much echo from most of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He was called back to France by his mother congregation. During the period 1920-1927 of his journey in Europe, he helped many Chinese students in their studies, founded some dormitories for students, and created a bulletin journal to promote intellectual evangelization. Besides all these works, h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in China. After his return to China in March 1927, he witnessed enormous turmoil: wars between warlords, a split of the political regime, the civil war between KMT and communist troops,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Our study concerns his observations upon some principle political figures, for instance, Chiang Kai-shek, Feng Yu-Xiang and Wang Jing-Wei... etc, as well as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camps (the right and left wings of KMT and communists). It allows us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for his option on the right-wing of KMT and the engagement of his medical teams of volunteers on the battlefields following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of the troops led by Chiang Kai-shek.

This study pursues two objectives: 1. Analysis of Lebbe's vision on the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 regime. 2. Since he put his claims of patriotism into action, this study could bring some light to the influences of his action on many leading

political and military figures,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camps, as well as on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Keywords:** Vincent Lebbe, Relation between Catholic Church and State in China, Catholic volunteers' team of medical service of wartime, French Catholic Protectorate in China, *Bulletin de la Jeunesse Catholique Chinoise*

輔仁  
宗教研究